

建國七十年勢必成為今年中國的热議話題。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風風雨雨，不僅值得後人追念緬懷，也是饒富意義的研究評論課題，敝刊歡迎海內外學者惠賜鴻文，回顧中國自1949年以來走過的曲折道路。

——編者

改革向何處去

任劍濤的〈從「球籍」危機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一文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究竟何去何從？

筆者認為，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歷史關頭，有一個根本問題被普遍忽略，那就是：改革的目的地到底在哪裏？由於改革初期阻力巨大，加上改革從一開始到現在都缺乏明確的、能得到大多數人民廣泛認同的理論指引，致使改革者選擇了實用主義的態度和策略，其典型表現就是所謂「不爭論」，「團結一致向前看」。或許在改革初期，人們對改革目標的認識差異太大，不擱置爭議就無法啟動改革。但問題在於，如果永遠擱置爭議，任何深層次改革都無法順利推進。原因很簡單，不能通過爭論形成對改革目標的共識，如何「團結一致向前看」？

長期以來，「改革開放」成為了「政治正確」的表述，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改革開放。但「改革開放」只是一個事實描述，而不是價值判斷。對改革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目標的認識才屬價值判斷的範疇。擱置對價值判斷或改革目標的爭議，空談改革開放，毫無意義。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不同的思想派別、利益群體雖然都在談改革開放，但他們所理解的甚至截然相反：自由主義者認為其目標是形成經濟上的市場化、政治上的憲政民主、社會上的自由多元；國家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卻要將改革開放局限於經濟領域，其目標不過是為了增強國家實力和代表國家的某個階層的利益。所以，前者強調「普世價值」，後者強調「中國特色」和「中國模式」。

前者一直都不是體制內的主流，甚至一旦冒頭就會被撲滅，也可以說，體制內的改革觀從一開始就與自由主義者的改革觀存在天壤之別。因為當政者對改革開放目標的理解本來在總體上就與民間自由主義者不同，也就可以解釋為甚麼當政者樂於強調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而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改革已死」，現在應該做的是「重啟改革」。

全社會應該追問，我們到底要怎樣的改革開放。這種追問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如果存在這

個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最終得出的共識一定是與國家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相反的，因為自由競爭本來就是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而自由主義是建基於個人主義的。如果說改革開放的目標是「改革開放」這個動詞詞組的賓語，確立了賓語以後，也就確立了主語。如果說「改革開放」的賓語是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些價值，那麼「改革開放」的主語也就只能是人民，只有擺脫人民未經認可的「被代表」的命運，才談得上改革的路徑問題。

蕭三匠 北京

2018.12.10

中國改革的意義是甚麼？

周雪光的〈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一文認為，「開放」是改革開放的「關鍵所在」，「對外開放是中國社會內部持續改革的動力源」。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緩慢的」。周雪光在把改革開放放入中國歷史的長時段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模式「以穩定為重，趨於封閉自守」，

而對外開放才真正提供了替代性的「價值觀念、運作模式和行為方式」，激起了區域經濟競爭，甚至是對中國歷史慣性的一個「脫軌」。

筆者對此有些保留。第一，在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間裏，經由陸路和海路的對外經濟活動從來都是正常進行的，沒有任何時代稱得上是完全封閉。因此，美國歷史學家韓森(Valerie Hansen)在書寫中國古代通史時，徑直將古代中國稱為「開放的帝國」(The Open Empire)。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四十年的對外開放不是中國歷史的「脫軌」，而是回歸常態。

第二，對外開放的最大貢獻在於對國外技術、資金的及時引進，以及對國際市場的開放和把握，並有效解決了沿海地區工業化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改革開放的最初動力其實來源於農民為了生存，要求回歸到一種更理性、更有利於發揮家庭和個體積極性的制度安排，即包產到戶。這種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民眾的需求和既有制度之間的妥協，而不是外界刺激的結果。改革動力恰恰最初來源於內部的民眾，不論是在安徽追求包產到戶的農民，還是在浙江從事地下經濟的百姓，是他們真正推動了改革。

第三，民眾不是改革開放的犧牲者，而是創造者和受益者。就筆者對四川老家多名親戚的觀察來看，假如不是內部改革提供了地域流動、選擇職業、創業的自由，絕大多數的親戚一旦不能通過升學或參軍改變命運，就將終生困守農村。改革所提供的廣闊社會空

間和多種可能性使他們極大地發揮了自己的潛能。通過參與私有經濟活動而獲得成就感，是改革開放過程中一個個體最能克服地域、身份、學歷限制，重塑自我的渠道。這種更重要的開放——對內開放，本質上是國家不再嚴苛地束縛民眾，而容許一定程度上的遷居、就業、創業的自由和對個體努力的回報。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民眾只要獲得一定的自由，就能夠釋出極大的潛力，而改革四十年的本質是把原本屬於民眾的自由還給了民眾。

伍國 美國
2018.12.15

先鋒小說的復蘇

當代中國的先鋒文學始於1980年代中後期，其代表人物有余華、馬原、葉兆言、蘇童等一批作家，先鋒文學憑藉和現實主義文學極為不同的語言結構、文學理念、書寫方法，對當時的中國文壇造成了巨大震動。然而進入1990年代後發生了轉變，包括余華的《活着》、《許三觀賣血記》，蘇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的出版，代表了這批先鋒作家重新回到了現實主義行列，因此許多評論家發出了「先鋒文學終結」的論斷。對於一般的中國讀者受眾而言，更容易接受的是現實主義作品，先鋒主義作品的流傳也遠不及現實主義作品。由此可見，先鋒文學在中國可謂是在夾縫中生存。

陳建華的〈「先鋒」的回歸？——論吳亮《朝霞》的當代先鋒性〉(《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一文認為，吳亮的

《朝霞》這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是對碎片化的世界閱讀的一種具有實驗性的回應，對於重塑當代中國文學的先鋒精神具有啟示作用。

作者尤其著重於討論《朝霞》的先鋒性，並指出《朝霞》具有深刻的「反小說」實驗性。一般小說書寫不會出現大量的議論，但這部小說卻夾雜了超量的議論，極大地挑戰了讀者慣有的閱讀習慣。文章認為「遊戲」是進入這部小說敘事迷宮的鑰匙，「革命」與「遊戲」的連接本身也包含了某種意味深長的隱喻，革命對於書中所述的那群孩子而言，就是一場「實踐遊戲」，並從模仿中獲得了快感。但筆者認為，文章談及的革命與遊戲的關聯性複雜而微妙，應還有討論的空間。

此外，文章着重討論了「實在內涵」與「真理內涵」的相互作用。《朝霞》十分完整地交代了眾多人物的家庭與成份，並且對於他們的生活習性、閱讀興趣和性格也有十分詳細的書寫。小說既有寫實的一面，也有非常先鋒的一面，透過「抒情」、「歷史」、「神示」和「哲理」聲調，營造了一種「眾聲喧嘩」、「多元對話」的結構。最後，作者指出小說如同一種「當代藝術」，以文字為材料進行拼貼、重組。但這樣一種極為後現代主義式的創作、充滿碎片化的書寫方式，是否真的可以讓人們透過閱讀克服遺忘，在迷霧般的歷史中找尋到「真相」？或許這也是當下這個時代對文學提出的挑戰。

楊森 廣州
2018.12.23